

A Study of “Orthodoxy”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900–1920)

ZHAI Xinyu

Wuhan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25, 2024

Accepted: February 6, 2023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I Xinyu. (2024). A Study of “Orthodoxy”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900–1920).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108–11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11>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1900–192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orthodox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orthodoxy”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isputes over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under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eanings, the concept of “orthodoxy”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wer”.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notation of “orthodoxy” has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 and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reality. The study of the concept’s ideolog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is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orthodoxy” in modern times and provides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Keywords: Orthodoxy; modernization; conceptual histor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I Xinyu is studying for a master’s degree at Wuhan University.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Conceptual History. Her email address is zhaixinyu0123@163.com.

清末民初「正統」論研究「1900—1920」

翟心娛

武漢大學

摘要: 清末民初以來「1900–1920」正統論的發展及「正統」概念的意涵變遷，體現出近代史學觀念的更新換代和

動蕩政局下確認政權合法性的紛爭。以傳統正統論為根基，「正統」概念與「權力」建立起緊密的關聯，其內涵在清末民初亦經歷了傳統意義回歸和現實政治轉向。從「正統」概念角度重審其發生的思想、文化與政治語境，即有利於展開近代「正統」概念史的研究，又為這一歷史時期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關鍵詞：正統；正統論；近代化；概念史

「正統」是中國歷史文化認知體系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對歷代史家而言，正統論對史學理論和史書編纂有重要影響；在意識形態層面，正統論幫助中國歷朝統治者構建了佐證政權合法性的關鍵論據。就歷代正統論而言，學界已經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針對近代「尤其在 20 世紀初年」正統論的專門研究仍相對薄弱。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現代部分集成了梁啟超、章炳麟、蒙文通和柳詒徵的正統論原文，卻並未展開闡述。^①專門關注近代正統論者，或以這幾位代表性學人觀點入手「其中，在梁啟超新史學視角下研究其正統論者尤多」，^②或從史學理論角度探討其對歷史編纂學之影響，^③或著眼於正統論之近代政治命運，^④鮮少論及正統論在清末民初的發展狀況。「正統論」，指圍繞「正統」一詞展開的論述，體現出論者本人的「正統」觀念。本文以「『正統』論」為題，意在梳理清末民初的各類「正統論」的同時，關注到這一時期作為概念的「正統」一詞在思想、文化和政治語境中的呈現，並以之作為管窺中國近代歷史變遷的一個重要切口。

一、新史學之「正統」觀

梁啟超的正統論是其新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代亦曾經有史家對傳統正統論提出質疑，但其立足點均難以觸及君統核心，梁啟超是第一次從近代變革的角度對歷朝追捧的傳統正統論的合理性進行根本批判。梁啟超這一思想提出的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正值清王朝歷經維新變法之時，因而其理論也具備著鮮明的破舊立新色彩。

梁啟超的正統觀念集中體現在《新史學》中。在《中國之舊史》篇中，梁啟超闡述舊史學之弊，首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正統論緣起於專制之弊，而舊史學無視朝廷國家之分別，以王朝為國家，更是助長了正統觀的強化，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通鑑綱目》都是如此。千年來，「國家」觀念難以在民眾心理中形成，和歷代史學家對王朝正統觀的強調不無關係。^⑤

在《論正統》篇中，梁氏開篇即為歷代正統論定性，對中國傳統史家的正統論進行批判。「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他隨即對「正統」概念進行闡釋：所謂「統」，意指天民必有君，而所謂「正統」，則指君主必唯一。他極言正統「奴隸根性」之弊，從史學理論的角度對史家正統論展開批判。他首先考據了「統」之濫觴，繼而引出「正統之辨」。他將歷代正統之辨別標準總結為六條：得地之多寡、據位之久暫、前代之血胤、前代之舊都、後代之所承者、中國種族。通過分析，他指出這六者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所謂持本朝正統觀點者，其實是穿鑿附會於君主專制，根本無法自圓其說。正統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歷代政治文化中留存多年而不衰，其原因有二：君臣自私本國，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⑥同一時期，深受維新思想影響的邱菽園甚至直言「古無正統之說。」他指出之後諸代所強調的正統，不過是出於統治者的一己之私附會而成：「諸家論正統之說，而重附宋儒之所私者」。^⑦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類史學理論背後有其政治動機，新史學對傳統正統論的批判，其目的是通過否定君主之史學，弘揚民眾之史學。在學術層面上，新史學要脫離舊史學正

統論的束縛；在經世層面上，強調要用民主的新政權取代專制的舊政體。實際上，梁啟超批判的並非正統論本身，他所針對的只是在歷代君主制下被不斷強化為專制統治工具的「傳統正統論」，根本反對的是中國現有的君權政治體制。在新史學的維度下，他認為真正的「正統」應當在於民眾，並賦予了「正統」以近代化的涵義：「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眾人非在一人也」，因而他推崇英國、德國、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度。^⑧

由此可見，在大力批判傳統正統觀的同時，梁啟超還通過對「正統」概念做出新的解讀，擺脫了傳統正統觀的桎梏。他還借用了「正統」這一概念勾勒出他的世界正統觀。他在《歷史與人種之關係》中提出了「世界史之正統」的命題，所謂世界觀角度的「正統」，指的是世界中有歷史的人種或稱發達的民族「即哈密忒人、沁密忒人、希臘人、羅馬人、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及其建立的國家才能稱之為世界文明史的正統。這些民族和國家之所以能夠作為世界史的正統傳承下去，是因為這些人種所創立的國家在文化和武力兩個方面都做到了影響遍佈國內外，推動全世界的發展進步。^⑨這兩種對「正統」觀念的不同詮釋看似矛盾，實則有其邏輯。林崗將中國古代正統論歸納為三方面含義：根據三統五運說確定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敘述與解釋歷史的理念框架、道德意義上的褒貶與批評。^⑩從世界正統觀的相關論述中可以發現，「正統」概念正逐漸從古代慣用的傳統正統論形式中脫離出來。梁啟超所秉持的世界歷史之正統，是相較於同時期世界中存在的諸多國家對比而言之，不存在多方爭取一國之合法柄權之說，因此不應將這一語境中的「正統」概念全然放在古代正統論的傳統框架中，而是應當理解為梁氏取「正統」概念的近代延伸意，即所謂「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權」來闡述世界史之正統。因此，討論所謂近代正統論，不能僅局限於中國古代歷史撰述中的政權正統觀念「即傳統正統論」，隨著「正統」概念的近代化，「正統論」之內涵在近代也獲得了新的闡釋。

雖然新史學對中國古代正統論進行了大肆批判，但在部分近代知識分子群體中，傳統正統論也可以被用作宣傳排滿反清思想的革命工具。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國粹學報》旨在通過刊登各類歷代經史子集等古文，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國粹精華，進而宣傳近代革命的思想。在 1908 年第 4 卷第一期「三週年大祝典」中，附錄刊登了南宋遺民鄭思肖《心史》中的著名篇目《古今正統大論》。該文強調夷夏之辨，認為「夷狄僭行中國之事」是亂了大倫，絕非中國正統，不可雜附於正史之間：「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國事，非夷狄之福，實夷狄之妖孽。」^⑪明末抗清鬥爭中熱極一時的鄭文此時被重新刊登，其借古反今之意昭然。值得一提的是，持反古代正統論的梁啟超卻對鄭思肖及其《心史》大為讚賞，認為其精神足以震蕩國人心靈，輓救國勢於危亡之間，有「超度全國人心，以入於光明俊偉之域，乃所以援拯數千年國脈，以出於層雲霧霧之中」之效。^⑫在章太炎的革命功人表中，「老儒碩學著書騰說提倡光復者」一目中列舉了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其中戴明世在列，闡釋其原因為「著南山集斥順治不得為正統」。^⑬《南山集》在康熙年間曾因其內容被指離經叛道、有反清復明之嫌而使戴明世遭到「狂妄不謹」的罪名彈劾，最終因「大逆」被判入獄不久被處死。滿清思想鉗制的文字獄案當事人在二百年後被認定為有反清革命之功，借用於佐證封建王朝合法的正統論卻被用來抨擊專制舊朝、弘揚近代革命，此舉亦值得玩味。

二、國際時局之「正統」論

漢語固有概念之所以在近代得到語義延伸，與其跳脫出本國社會語境，應用於世界情境之闡述息息相關。1906 年，在朝廷大員責任內閣設立與否的討論中，御史趙炳麟上奏支援組織內閣，確定責任制度。他主

張確定責任制度以立憲，從而避免專制制度之流弊。「欲責任制度之確立，必有督責之柄者。故東西各國政治家，皆以英內閣代表全球，曰責任內閣，亦曰正統內閣。」¹⁴正統內閣之說法首見，結合語境分析之，其意可能有二：一指諸國責任制度多樣，而其中英國的責任內閣制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類制度，正統應取「典型」之意；二同「責任」一詞並同，可能與正統古義「代表政權之合法性」有關，聯繫起來推斷，將責任內閣於現代國家制度類比傳統帝王於古代國家制度，二者均有「正統」之含義。

「正統」與「lineal」的對譯使中文「正統」概念得到了進一步充實，相關的「正統論」也在跨文化語境下有了多層次的含義。1911年，《神州日報》在《革命軍與國際公法》中從國際法的角度研究歐洲各國對清國革命的態度，提到了歐洲政治外交領域的重要原則「正統主義」。「正統主義」與「Legitimet 或 Legitimacy」對譯，而「Legitimet」源於19世紀上半葉的法語 *légitimiste*，其背景正是維也納會議。這一對譯使「正統」概念的內涵得到了豐富，即在認可中國傳統正統觀中「正統」概念的基礎上，還吸納了國際公約中的「正統主義」原則，使國家層面的「正統」不僅包含對內的政權合法性，更涉及對外的多維度的自主性。《神州日報》的文章中提到，正統主義早在1648年維士頓佛利亞之條約即「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便已成為領土與主權認定的「國際慣例」，直到被拿破崙所打破。作者在此處重提正統主義，意在藉此與國民主義共同強調西方不得干涉清國革命後民國的領土繼承與主權問題。¹⁵

其他在國際背景下使用「正統」這一概念者，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情況：第一種為在國際上其他國家之政治局勢的報導或評論中，以「是否正統」作為區分持有不同政治主張的派別之名稱。例如，美國共和黨內部的正統派及分派；¹⁶上院黨派中的進步派與反動派、急進派與保守派、獨立派與正統派；¹⁷日本刑法派別中以古賀廉造《刑法新論》為代表的舊派、以泉二新熊《刑法講義》為代表的中派、以《法政叢編》及丙午社譯《岡田氏刑法》為代表的新正統派。¹⁸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正統派」和「修正派」¹⁹等。第二種則是在學術理論尤其是經濟領域的研討中，對於西方經典學說的稱謂。例如，1909年《盛京時報》介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稅收四原則之一平等主義時，稱其為「所謂正統學派之理財學」²⁰，此外還有「正統派經濟學家」²¹、「正統派經濟學者」²²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也有了「正統派社會主義」²³的說法。

此外，傳統意義上的正統論仍然適用於國際上實行君主制的國家。1907年5月28日，《神州日報》在一篇關於葡萄牙政界現狀危機的報導中稱，日前召開的議員群眾會議議論紛紛，政府強調君主專制政體之弊害，然而王室及「正統宗派之人」²⁴則抵制政府之治。1913年在《盛京時報》一篇介紹蒙古庫逆與俄國代表協商草定的蒙古帝國憲法大綱的文章中，首條即為「皇帝為蒙古王朝之正統以配大蒙古帝國……」²⁵《東方雜誌》刊登有賀長雄和許家慶的學術文章《拿破倫正統相續者之產生》，所謂拿破崙正統相續，指的就是拿破崙世系子孫。²⁶日本大正五年「1916年」立儲大典上「裕仁殿下……帝祚垂正統，延頸拳踵，不勝輸誠歡忭之忱，」²⁷被立為儲君。在這些語境下，「正統」仍取其古典意，為專制王權中統治者及其嫡系。

三、民國政局之「正統」論

「正統」這一概念，在民國成立後即被政界各方勢力爭相利用，以申明自己統治之合法。在這種截然煥新的政治環境中形成的新「正統論」看似解除了古代正統論中與宗法、道統、帝統等傳統要素甚緊密的關聯，但實際上，民國初期這一概念仍然與權力直接掛鉤，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工具，得以應用於近代史學的書寫



當中。

1914年6月,上海《時事新報》的一則社論中提到,新官制行將推廣,官員即將面臨改組。作者認為現在的政府所用的官員基本沿襲於臨時政府,而臨時政府中居要位者,則以南京人士居多,北京舊人甚少。推測其用意是「以南京政府作為正統,而以北京人物為附屬品。」但是社論指出,這一方法與今日之形勢「殊為不和」,應當重新改組,「將統系特加更正。」²⁸不日,又發一社論,稱「中央政治集權於一人,文治一面以政事堂為正統機關,外有所謂財政討論會,政治討論會……」這些社論的背景是袁世凱當權後北京政府實行的一系列政治舉措,民國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凱頒布《中華民國約法》,同時對中央和地方官職推行改革,為自己的權力擴張鋪路。其調整官員成分的措施,便是削弱中央政府內的南京勢力,為其於北京掌權做的準備。根據袁氏約法規定,總統制取代內閣制,中央廢除國務院,設立政事堂,政事堂置國務卿一人讚襄之,總管各類行政事務,其權力無上集中於總統一人。社論指出,雖設所謂政治討論會和促進會為重要機關,但由於「總統之任意以」,「欲聞國政,僅得其一部」,故謂政事堂以「正統機關」,²⁹足見其在中央權力系統中的核心地位。

袁氏復闢中,傳統正統論作為確立君主專制、擁護袁氏上位的有力依據而被一群官僚大肆渲染。這類話語中提及的「正統」概念回歸傳統含義,根植於舊觀念的領域,帶有傳承帝制的本義,由此抒發的各類正統之論說也不免趨於保守。1915年,各省軍閥已經紛紛表態支持恢復帝制,北洋軍官張敬堯更是就此上書公府,進一步請求總統「速正帝位」。他認為,君主立憲的政體是今日救亡圖存政治道路的最佳選擇。中國歷代採用君主國體,已使君主在民眾心中形成了崇高的地位,具有不可或缺的社會象徵意義:「正統相傳,近五千年,君主二字早已印入人人腦筋之中,以為神聖不可侵犯,奉之為神明,尊之為帝天。」而君主的正統一旦被可選舉的總統所替代,則會導致選舉之時紛爭不斷,不利於社會的穩定發展,辛亥後成立的所謂共和國體弊病叢生便是最好的例證。³⁰1915年底的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後,國民公意「選舉」大總統袁世凱任中華帝國皇帝,其發表通告稱,共和政體實在不適宜於我國,而「國家創業垂統,肇始羲軒,數千年歷史,相承君統,未嘗中絕,即在群雄割據之時,而正統偏安,猶待史家論定。凡以明一日不可無君之義,即可知四海攸賴一人之殷。」³¹在辛亥革命後,我國面臨「群龍無首,變故迭生」之危機態勢,急需正統之君主把持全域,重振中華雄風。國號定奪中,也自稱其繼承歷朝歷代千年中華正統:「中國之為華夏歷數千年,我朝上承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元明之正統」,以「今五族一家同為中華」之故定為中華帝國。³²在這一論調中,反革命分子極其黨徒通過宣揚正統論,強調中華歷朝自古有帝王正統存續而代代相傳,稱正統一旦中斷即會導致社會動亂,將「正統」與君主專制制度劃上等號,強行將復闢帝制的倒行逆施包裝成「承天建極」之必然。

當然,也有有識之士批判袁氏復辟之鬧劇,其立意點便是對中國傳統正統論的徹底否定,和對「正統」概念的近代化詮釋。1915年底,在袁氏復辟之謀愈演愈烈之時,王樹公借古代之傳國玉璽之故,指出在當下民主共和大勢之下妄圖返復專制皇位正統之謬:「近聞有索國璽改易國旗,甚且有重招闕寺,恢復拜跪之說,一若專制君主相沿之陋習,缺一即不足以示尊崇。夫國璽鑄自嬴秦經漢晉遺失,史家恆指今璽為偽物,若狃於正統相傳之迷信,則強有力者與國以此璽,喪亂時之亡國亦以此璽也。」³³袁氏復辟很快激起全國之民憤,在軍事上推動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的同時,思想文化界也對被濫用的正統論進行了反思。在《神州日報》刊登的《國法上民國迴旋之途徑》中,作者批評了舊式封建國家盡拜君主、專仰人治的做法,否定了以「君統」作「正統」,認為所謂「君統之正統」在當下的民國社會已經斷絕:「而君姓正統之論所由嘖嘖於昔也,今心事國

家民自為政，歷史上之君統已斷，所由繫維眾志者維法而已。」作者認為「正統」概念應存在於法律之中：「法律亦有正統」，如果破壞了法律的尊嚴，「則小之長蔑法之漸大釀篡法之禍。」但是在當下的中國，袁世凱復辟帝制使法律之正統遭到了破壞：「乃袁氏不道竊造附亂之嫌，故毀法定之數。」袁世凱公然藐視約法，使民國的法統被廢棄；但通過定製新約，便可以推翻袁氏的所謂正統。因為他認為專制政府實際上是在「無法律狀態」下的。「為今之計，在正法統，統正則名言交順……斬斷袁氏法統之煩亂者，即以正民國法統之大名也。」在作者看來，如果說正統是國家發展所必須存在的，那麼正統的含義是可以隨著時代需要而變化的。「正統」概念，在中國古代解釋為君姓正統即「君統」，而現在「即民國」應當以「法統」作為這一概念的基本認知。^④彼時北洋軍閥中，亦有馮國璋、總理段祺瑞反對袁氏稱帝，不承認袁氏所定的《中華民國約法》，仍主張舊臨時約法之有效，要求召開會議迅速制定新憲法。馮國璋在一則電報中稱「新約法為總統制，今日已不適用，當時制定，又未按照定程修改，在民國法系，為非正統。」也將「正統」概念應用於法律的話語體系之中，認為法律制定有其制定規程和應用範圍上的正當性。而否認袁氏約法在法理上的正統性，實際上也是否定袁氏掌權的合法性。^⑤

袁氏復闢期間被否定的傳統「正統」概念，在北洋混戰時期以「中華民國之正統何在」被各派爭相利用，而這一階段的「正統」概念既非「君統」，也非「法統」，而是直接映射當下柄權的政治話語。袁世凱死後，民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局面。1917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借「民國正統」之名義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與北洋政府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民黨現因北方為暴力所磐據，議會正論未由伸張，不得已而在廣東組織軍政府，以謀西南諸省之統一，存民國之正統。」^⑥「因國會南遷開會，廣州新組政府側開。國會之所在，即民國正統之所在」^⑦強調南方的臨時政府並非擾亂國內政治秩序的非法政權，而是真正繼承辛亥後中華民國之正統、為保衛《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存在的合法政權。1918年1月9日，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就「國共和之恢復」發表演說，闡明當下的形勢為「今日國會開非常會議，實為應變當然之手段，或者不察疑為非法，且國是不承認由國會產出之軍政府。」由於正統性未被樹立，目前的軍政府在全國範圍開展內行動處處受到掣肘，「試問復辟以後，民國已亡，橫覽國中，除軍政府外，更誰是真正中華民國之正統者？」^⑧他將今天的軍政府比喻為「遺腹子」，認為無論是於法於理都應當承認以軍政府為正統，只有在各督軍和人民都確認軍政府之正統地位後，才能消除各方紛擾，同心協力擁護共和。雖有人對這一「遺腹子」理論提出質疑，^⑨但孫中山的宣傳顯然是有效的，廣州軍政府的正統地位仍然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擁護：陳炯明、張開儒、李福林通電聲明擁護軍政府作為民國唯一正統政府，稱：「憂時之士，鹹知民國正統繁乎？……自茲以往誓率所部以擁護國會，擁護軍政府以圖早日解決大計。」^⑩有人評論時局，認為正統之爭是導致今日軍閥混戰、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今日世局之亂也。由於槍與槍爭，質言之，北洋派之軍人持其北洋為正統之軍閥主義，而目北洋以外之軍人，概為非正統之軍閥主義，而目北洋以外之軍人，概為非正統，於是欲以自派之勢力遍布全國，美其名曰統一夫。」^⑪各派軍閥均視自己為正統，並以此為出發點，力求全國的統一，使自己的勢力統領全國，從而達到統治上名正言順的「正統」。

「正統」淪為軍閥混戰標榜的政治工具，很快受到了批評。南北為了正統問題紛爭不斷之時，恰逢一戰結束，巴黎和會行將召開。應當由誰代表中方派出代表參加國際和會，亦引起南北新一輪的正統之爭。張東蓀發表時評，批評在北方已決定派出陸子欣的情況下，南方仍要單獨派使。他指出南方不應執著於正統，而是應當站在全國人民的立場上，就北方未提的國定稅率問題進行補充：「若不此之務，專門抱定了一種「正



統」思想,不在人民的真利害上設想,只爭虛名,將來的結果是容易看見的。須知正統思想是帝國時代的產物,現在只可拋在 W. C. 的裡面了。』對於所謂正統之爭,他認為純屬無稽之談,在近代社會的今天,正統與否的虛名並無意義,真正愛戴民眾的政權才是能被擁護的政權:「非正統能愛民,民就擁護他。正統要虐民,民就革他的命。」^④他又發表《中國式與俄國式》,認為中國革新運動中正是因為過於強調正統的形式主義,導致了諸多問題。他指出,「中國式」的革新運動有兩個要素,一是「不痛快」,二是「止爭名位」。如武昌起義後不久政權被送給袁世凱,此次西南稱兵也只是力爭法律上的消極性質,而這是「正統」思想的流毒所導致的。這種「中國式」拘泥於形式,過於強調所謂正統的名義、合法的手續、正當的職位取得,是污濁的、含有雜質的壞精神:「可見得中國式是從死法律上著想,所以不脫「正統」思想的謬見」。^⑤勞人在《正統誤人》中更是將矛頭直指正統論,稱其誤人又誤國。由於北京在歷史地理上具備著卓越的政治區位優勢,這導致在眾人印象中北京既作為中國政治的中樞,也是官僚統治的中堅。所以一旦在北京掌握政權,無論如何貪腐竊盜,均可奉為正朔,繼而阻撓中國之革新力量:「袁世凱之帝制自為,張勳之叛國復辟,徐世昌之保持總統,能號招一時者,均賴此心理以維繫之,是正統思想之足以禍國也。」^⑥它既可以作為復闢者鼓吹君權的歷史依據,又可以成為政軍各界爭奪柄權的名義支援。

正統之說,論者紛然。^⑦清末民初的「正統」觀變遷,既體現出近代史學思想的更新換代,還蘊含著在動蕩的政治局勢下對政權合法性重新確認的嘗試,形成了一種重新審視歷史的獨特視角。「只有在對一個概念的具體使用環境中,我們才能得到對這個概念的恰當分析,也才能真正理解這個概念。」^⑧從反抗「君統」到復歸「君統」,從構築「法統」到論爭「合法」,「正統」概念經歷了一系列的傳統回歸和現實轉向,在各方利益詮釋中仍在不斷強化著其與權力的緊密關聯。「正統」的「權力」內涵,正是基於傳統正統論所闡發出來的核心要素。^⑨由此可見,清末民初「正統」這一概念,在根植「權力」的基礎上,也在自我更新和跨境交流中逐漸嘗試著進行近代化的語義轉變。回顧清末民初「正統」及相關論述的發展進程,瞭解其豐富的應用領域和充實的多樣內涵,不僅可見作為史家傳統命題之「正統論」的近代更迭,還展現出近代中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變遷,這些認知都統一於 20 世紀初年中國迅速變遷的現實中,構築了晚清民國之際新舊文化激撞的一個獨特面向。

參考文獻

- ① 饒宗頤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年版,頁 244-253。
- ② 侯德仁:《清末民國學人與歷史正統論》,《學習與探索》,2012 年第 3 期,頁 157-160。
- ③ 舒習龍:《近代正統論的嬗變及其對歷史編纂學的影響》,《社會科學論壇》,2010 年第 22 期,頁 39-50。
- ④ 聞軒軒:《「正統論」的近代命運及其終結》,《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2 期,頁 73-84。
- ⑤ 梁啟超著:《中國之舊史》,《飲冰室文集之九》,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36 年版,頁 1-7。
- ⑥ 梁啟超:《論正統》,《飲冰室文集之九》,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1 冊,頁 20-26。
- ⑦ 邱菽園:《論說:正統博議》,載《鷺江報》第 10 冊,廈門:鷺江報館,1902 年 7 月 11 日,頁 2-4。
- ⑧ 梁啟超:《論正統》,《飲冰室文集之九》,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1 冊,頁 20-26。
- ⑨ 梁啟超:《歷史與人種之關係》,《飲冰室文集之九》,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1 冊,頁 11-20。
- ⑩ 林崗:《正統論與中國的國家認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4 期。

- ⑪ 鄭思肖：《正氣集：鄭思肖古今正統大論》，《國粹學報》第4卷第1期，上海：國粹學報館，1908年1月20日，頁234-240。
- ⑫ 梁啟超：《重印鄭所南〈心史〉序》，《飲冰室文集之十七》，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冊，頁12-13。
- ⑬ 《章太炎所舉之革命功人表（續）》，《神州日報》第2164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3年4月19日，第7版。
- ⑭ 趙炳麟：《論責任制度疏》，《趙柏岩集（上）》，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頁452。
- ⑮ 《革命軍與國際公法》，《神州日報》第1645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1年10月30日，第2版。
- ⑯ 《美國共和黨之大會議》，《盛京時報》第1120號，瀋陽：盛京時報館，1910年8月2日，第2版。
- ⑰ 旅美：《美國最近政局之一斑》，《神州日報》第2180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3年5月5日，第2版。
- ⑱ 崔雲松：《誠新法官（續）》，《神州日報》第1337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0年12月10日，第2版。
- ⑲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綱》，《神州日報》第4782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9年8月11日，第10版。
- ⑳ 《比例稅遞加稅說略》，《盛京時報》第939號，瀋陽：盛京時報館，1909年12月19日，第2版。
- ㉑ 譚鳴謙：《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續）》，《神州日報》第4709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9年5月30日，第10版。
- ㉒ 郭慶棠、潘公展：《富與福（學術演講會第三次）》，《時事新報》第4159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9年7月30日，第11版。
- ㉓ 李培天：《社會主義者所見的大戰真因「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是致亂的」（續）》，《時事新報》第4321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20年1月9日，第13版。
- ㉔ 《葡議院抵制專主之萌芽》，《神州日報》第65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07年5月28日，第2版。
- ㉕ 隱：《密探電告庫逆之憲法大綱》，《盛京時報》第2074號，瀋陽：盛京時報館，1913年10月5日，第6版。
- ㉖ 有賀長雄、許家慶：《拿破倫正統相續者之產生》，《東方雜誌》1914年第10卷第10號，上海：商務印書館，頁39-40。
- ㉗ 《恭頌帝國立儲盛禮辭》，《盛京時報》第3000號，瀋陽：盛京時報館，1916年11月3日，第1版。
- ㉘ 《政海拾遺》，《時事新報》第2325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4年6月11日，第3版。
- ㉙ 《政海拾遺》，《時事新報》第2334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4年6月20日，第5版。
- ㉚ 《張敬堯請速正大位之文章軍界第一篇勸進表》，《神州日報》第3048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5年10月6日，第6版。
- ㉛ 《籌備國民代表大會事務局之通告》，《盛京時報》第2763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6年1月21日，第2版。
- ㉜ 《復闕軼史》，《神州日報》第3815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7年11月29日，第5版。
- ㉝ 《王樹公致參政院書（續）》第3093號，《神州日報》上海：神州日報館，1915年11月20日，第2版。
- ㉞ 其次：《國法上民國迴旋之途徑》，《神州日報》第3293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6年6月15日，第2版。
- ㉟ 《馮華甫主張舊約法之要電》，《時事新報》第2047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6年6月18日，第3版。
- ㊱ 《日外相與張戴談話之內容》，《盛京時報》第3256號，瀋陽：盛京時報館，1917年9月11日，第7版。
- ㊲ 《西南對於調停之主張大致以恢復舊國會為結束》，《神州日報》第3818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7年12月2日，第3版。
- ㊳ 《孫文之大演說軍政府為民國正統擊督署系表彰公道擬出發雖行乞亦可》，《神州日報》第3858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8年1月17日，第3版。
- ㊴ 見丹斧：《正統遺腹子》，《神州日報》第3859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8年1月18日，第6版。作者認為孫文於中華自命正統，卻甘居遺腹子，其父身份是難以辨認的：一個是上帝、一個是生父、一個是民國。而馮氏也有三個父親，滿清、項城、民國。那麼馮、孫二人皆民國之子，二人應當為兄弟。孫認為，民國不死猶死，但是馮卻認為，民國死猶不死。由此引發一系列怪誕的疑問和聯想。
- ㊵ 《擁護軍政府之粵滇軍張陳李之聯名通電》，《神州日報》第3915號，上海：神州日報館，1918年3月24日，第3版。
- ㊶ 悲觀：《筆與槍》，《時事新報》第3690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8年4月8日，第2版。
- ㊷ 東蓀：《南方遣使歐洲和會問題》，《時事新報》第3948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8年12月23日，第2版。



- ⑬ 東蓀:《中國式與俄國式》,《時事新報》第 4164 號,上海:時事新報館,1919 年 8 月 4 日,第 5 版。
- ⑭ 勞人:《選評:正統誤人》,《興華》第 17 卷第 48 期,上海:華美書局,1920 年 12 月 15 日,頁 9-30。
- ⑮ 章太炎著:《史學略說》,《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版,頁 135。
- ⑯ 江怡:《語言分析與概念分析》,《外國語文》,2011 年第 27 卷第 1 期,頁 54-57。
- ⑰ ZHANG Jianping & HUANG Xiya. (2021). Thick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social scie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the C-E translation of *China's Solution to Its Ethno-National Issu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1(3), 181-189.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